



胡適研究禪宗史的努力與貢獻

智銘

(續完)

「竟成壇經傳宗」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……(是)「竟」然變「成」用「壇經」來作為「傳宗」的依約。……」

關於「竟成壇經傳宗」這句話的解釋，印公與錢先生的看法畧同。胡先生在民國十八年校寫「神會語錄」時所撰的「荷澤大師神會傳」內，對這句話確如印公所說，將「傳宗」視為書名在旁邊加了「」號，同時也有「傳宗不知是否『顯宗記』？」的小註。他當時爲了求證心切，而鑽了牛角尖，因而有那樣的懷疑和誤認，一個從事考據的史學家，對任何書籍及文字，首先都是持懷疑的態度，他曾說過一句話：「做學問要在不疑慮有疑，待人要在有疑慮不疑。」因爲「疑」，所以容易鑽牛角尖。胡先生曾在「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」內，有這麼一段話：

「今天我很高興得參加蔡(子民)先生八十四歲誕辰紀念會，朱先生要我作一個學術講演。在匆忙中，不容易想到一個題目。多少年來鑽牛角尖，作水經注考證；但這個問題在民國三十八年蔡先生的紀念會上曾經講過——整理四百年來水經注成績的小史——不能再講了。臨時想了一個題目——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。」(胡適禪學案一五一頁)。

胡先生自己承認因考證水經注而鑽了牛角尖。考證「竟成壇經傳宗」一語時也是如此吧！

但是，一九五八年八月重新校寫「神會和尚遺集」時，自己發現了錯誤，將這句話「弄明白」了。自動地將「傳宗」旁邊的「」號及「傳宗不知是否『顯宗記』」的小註，用紅水筆劃掉了。

一個寫作的人，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就不能算他的錯。他用紅水筆劃去原文、原號，痕蹟猶存，讀者才知道胡先生會「犯錯」，若他用墨筆劃去，沒有留下痕蹟，讀者就發現不了他的錯，試問：自民國十九年「神會和尚遺集」出版以後，至印公撰文(六〇年二月)之時止的四十年間，誰曾指出了胡先生的這一點錯？胡先生自己發現錯而自我更正之處甚多，這正是學者的好風度。

「傳宗」二字解決了，「竟成壇經」四字，胡先生似仍保持原來的見解，印公將這句話解釋爲「『竟』然變『成』用『壇經』來作為『傳宗』的依約」也不無道理，但究竟誰是誰非，仍有待新史料的發現比勘了。

研究思想與研究歷史，用的方法可能不同，研究思想的傳承，可以超越時空，如民國十年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在桂林問國父孫中山先生說：「你的思想基礎是什麼？」孫中山先生答覆他：「中國有一個傳統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相繼不絕，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，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。」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超越了時空，繼孔子而有之，自孔子到孫中山先生的這一時空，思想人物發生了怎樣的變化，他可以不管。但研究歷史的傳承，不能用超時空的「傳統」辦法，而必須用考據的辦法。將誰承誰之後，誰有什麼文、物創作，必須弄得清清楚楚，不可張冠李戴，更不可攀龍附鳳錯認祖宗。胡先生研究禪宗史，用的是第二個方法。至於他考證的結果是否與事實完全脗合，那就要看史料是否充足，前人留下的史料是否有心或無心作偽，如果史料足而又無偽造，那末，考據的結

論一定是正確的，因為沒有任何考據史家要故意將自己的考據作錯誤的論斷。

丁、胡先生的爲學態度問題

對胡先生爲學態度予以嚴詞抨擊的，在我所看到過的文字中，以印公最爲坦率，他在「神會與壇經」一文內說：

「我讀胡適有關禪宗史的文章，有一點難以理解，就是他筆下的刻薄，有刻薄得出乎常情。例如說到安祿山起兵，他說：『當日倍受恩寵的北宗和尚也逃散了』（神會集六八）筆者註：應是六九頁），後來又在上眉批，加上一筆：『也許靠攏了』。這是用心刻薄的流露，與考據無關。他不是說和尚『捏造』，就說『作偽』。在古代，禪宗在傳說中，傳說是有流動性的。附會與作偽，都不能說沒有。然作偽與附會不同，附會與傳說的變化不同，沒有確切的證明，是不宜籠統的，任意看作捏造與作偽的，我總覺得胡適的心是有問題的。最近讀到他給浩徐先生的信（胡適文存第三集一二五—一二六）才恍然大悟，他在信上說：

「浩徐先生……我自己自信，雖然不能殺菌，却頗能捉妖、打鬼。這回到巴黎、倫敦跑了一趟，搜得不少據欸結案的證據，可以把達摩、慧能，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給打出來。據欸結案，就是打鬼。打出原形，就是捉妖，這是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，這是整理國故的好結果。」

整理國故（中國故有文化），研究禪宗史，原來只是爲了捉妖、打鬼。對禪宗史來說，只是想到禪宗史裏捉虱子，找縫罅，以發現捏造與作偽的目的。這是什麼治學態度？存這種心理，考據也好，歷史學也好，都如戴起凹凸鏡，非弄得滿眼都是凹凸歪曲不可，這也難怪胡適禪宗的離奇，以及到處流露惡意了。」

印公這一段對胡先生爲學態度的批判文字的激烈，印公的定力可能也爲之動彈了一下，現在對胡先生爲學的態度，就個人所

知，畧爲申說。

看胡先生發表過的文字中，凡是真正送刊的出版文字，他的態度是相當嚴肅的。很難有「刻薄得出乎常情」的語句，他的「心」也是沒有多大「問題」的。但是在講演、書信、手記時，或也有文人難以避免的幽默的一面；如民國二十三年二月應邀到「北平師範大學」講演，他開頭說：

「黎先生！各位同學！今天兄弟是來還債。以前李校長和黎先生同我說了多次，叫我來講演，我因爲事忙，時間不容許，雖然答應了，終沒有辦到，所以欠下這債來。到了這學期，定要我來講四次，除了第一次是原本，其餘三次，好像是加了三倍利息似的。所以，這一回，我可以說是受到黎先生的重利盤剝了！」（胡適禪學案四五九頁）。

胡先生在他的講演時，也常有幽默語，這些幽默語目的是在提高聽者的興趣，是不能當真的。

關於印公說「天寶安祿山兵起，他（指胡先生）說：『當日倍受恩寵的北宗和尚也逃散了。』後來又在上眉上批，加上一筆：『也許靠攏了』。」經查：這段話是在「神會集」六九頁，並非六八頁，六九頁的天地、左、右並無「也許靠攏了」五字，六八頁也沒有。是否是版本不同呢？即使是版本不同，「胡適紀念館」也不會將這五字去掉，因爲這是照相出版的本子。再說，「胡適紀念館」也沒有要去掉這五字的必要，因爲凡胡先生留下的字跡，都被原狀保存着，至於當時的和尙有沒有靠攏的人，誰能說沒有，不但古時有，現代也有。

關於「捏造」、「作偽」的問題，胡先生說的可是老實話，一點也沒有刻薄，凡讀過胡先生的著作的人，就能明白地了解過去的人與他們寫的書，多少是「捏造」、「作偽」的。如果一一列舉出來，將成巨冊。別的不說，禪宗究竟有幾代？爲什麼會有那許多說法？又「六祖壇經」原始本是什麼？敦煌本有多少字？經過多少人的竄改，今本的「六祖壇經」與敦煌本的面貌同還是不同？那些同，那些不同？爲什麼不同？誰使它不同？又宗密究竟是淨衆寺神會的兒孫抑是荷澤寺神會的兒孫？如果他故意錯認

祖宗，爲的是什麼？……這些的問題，我們教內的大德們從來信古而無懷疑，不管古人是真實的、偽造的，照本宣科用來教育徒子徒孫，一千多年來都是如此。現在有位學者花了他大半生的寶貴時光，爲我們找出實情，將那些「捏造」、「作偽」的事實和人名敘說出來，這有什麼不對。

關於「捉妖、打鬼」的問題，胡先生也不是「找縫罅」，故意要跟佛教過不去。須知，生命是寶貴的，佛陀也說：「人身難得」，難道一位學貫中西、國際知名的學者，會浪費三十多年的時間研究禪宗史，只是爲了「找縫罅」嗎？胡先生的信內最後兩句說得很明白：「這是整理國故的目的與功用，這是整理國故的好結果。」他研究禪宗史，是將禪宗思想視爲中國的國故之一，爲了「整理國故」才研究禪宗史，印公將胡先生的「整理國故」四字之下，加上（中國固有文化），顯然將胡先生的「國故」局限了、太狹窄了。已與胡先生的原義相違了。整理國故的人，就是要將歷史人、事作善惡的明顯劃分，善者歸善類，惡者歸惡類。孔子作春秋，亂臣賊子懼。孔子對那些「心達而險，行辟而堅，言僞而辯，記醜而博，順非而澤」的妖、鬼，不但筆之於春秋，要「捉」要「打」，甚至將他殺來示衆。歷史學家對歷史人物的批判是無情的、是公義的，絕無「慈悲方便」或「官僚鄉願」之氣。這就是歷史學家與宗教家、政治家爲學態度不同之處。所以，讀胡先生的著作，似無「凹凸鏡」的感覺，相反地，倒有「顯微鏡」的感覺，借這顯微鏡使一千多年後的人，看清了那些古人是妖是鬼，從而避妖鬼邪說，而就佛陀正道。這正是胡先生的金剛菩薩行，無量功德啊！誰能保證過去的人沒有妖也沒有鬼，不但過去的人有妖有鬼，現在的人妖鬼更多，甚至由妖鬼而變成魔了，試問：我們教內大德有幾人捉了妖、打了鬼、降了魔？我們自己不能「捉」不能「打」，有人代我們打鬼捉妖，正是求之不可得呀！我看胡先生不但沒有「惡意」反而是「善意」。

印公對胡先生的爲學態度，雖然作了激烈的抨擊，但他對胡先生的貢獻仍是讚嘆的，印公說：

「胡適爲了中國哲學史，接觸到中國的禪宗史，在巴黎、倫

敦發現了神會的作品，比對敦煌本『壇經』而作出神會造『壇經』的結論。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，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，仍舊是有貢獻的。胡適說：『一千多年中，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，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，莫有過於此事的了。』（神會集七三—七四）這不能說不是實話，憑他的努力，神會北上努力於禪宗的事蹟被發掘出來，這不能不說是難得的！尤其是有關神會的作品，他一再搜求，校正發表，對禪學及禪宗史的研究，給以參攷的方便。考據，原不是以絕對的姿態來表示自己，任何大學者也可能會有錯誤的。在研究的立場，即使是錯誤的，能引出問題，或搜集資料，對後來的研究者，也還是會有所幫助的。所以我並不以胡適論斷的錯誤而輕視。覺得在禪宗史的某一環節上，胡適是有了良好的貢獻。」

印公對胡先生的這一評論是相當客觀的，對胡先生的認識是較公正的，我過去因胡先生提倡完全西化，要將中國固有文化全部推翻很爲不滿，但對他在禪宗史的研究方面說，不但有着欽佩甚至有着感激的心情，深感胡先生的著作，對研究禪學或禪宗史的人不但有「參考的方便」，而誠如印公所說：「寫中國文化史、哲學史、佛教史的作家們（除了玄學家），還是會採取胡適的論斷。」俗語說：「不怕不識貨，只怕貨比貨。」寫中國文化史、哲學史、佛學史的作家們，不都是人云亦云的膿疱，其中自也有一些明辨是非之士，在「貨比貨」之下，當會作思維的判斷，而不是僅因胡先生的著作「是經過考證來的」（印公語）就盲目的採信。但如認定他的著作較與史實接近，又不得不採信。

胡先生用三十多年的時間專心研究禪宗史，以至其他的許多研究、著作工作都被攔了。三十多年來，因他的努力，找出許多從未見過的史料，也鋪設了一條研究禪宗史的道路，他對史料的處理寫出了許多著作，本文無法一一介紹，如有機緣，再作個案的研究。研究禪宗史者只要朝着胡先生鋪設的步道前進，相信能找出與歷史事實相近的禪宗史來。

六九年九月三日寫完